

[美] 伊斯雷尔·柯兹纳

冯兴元

景朝亮

檀学文

朱海就

译

冯兴元

朱海就

孟庆龙

校

市场过程的含义

西方现代思想丛书

17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美] 伊斯雷尔·柯兹纳

冯兴元

景朝亮

檀学文

朱海就

译

冯兴元

朱海就

孟庆龙

校

市场过程的含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场过程的含义：论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 / (美) 柯兹纳著；
冯兴元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9
(西方现代思想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1407 - 0

I. ①市… II. ①柯… ②冯… III. ①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研究
IV. ①F091. 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666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庆红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875

插 页 2

字 数 258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之一

主 编 冯隆灏

执行主编 茅于轼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冯兴元 孟庆龙 陆玉衡

陈 凌 何梦笔 青 涠

郭开文 陶季业 韩永明

中文版序言

茅于轼

我应邀写这本书的序言，感到很为难。因为我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对经济学的历史所知甚少。这本书中讨论了许多19世纪末以来经济学的派系发展过程，它们之间的分歧在外行人看来并不显著，理论的大框架都差不多，绝没有和马克思《资本论》那样的分歧。要弄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着实要费好多时间，这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但要说“市场过程的含义”，我多少还是有发言权的。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市场经济中生活的，以后经过了30年的计划经济，最后又是30年的市场经济，对不同制度下的经济状况确实有很深的体会。所以我答应通过对“市场过程的含义”的讨论，谈谈市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的过程有什么特点。

人类在最近的二百多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过去的几千年比较，这二百多年的变化超过过去几千年变化的十倍以上。拿人口数和平均寿命这两个物理指标来看，过去几万年，人口只有十个亿（1800年的统计），二百年后的今天，人口增加到70亿，比二百年前增加了六倍。平均寿命在1800年只有26岁，现在提高到68岁，增加了两倍多。如果拿财富的生产看，变化还远不止此。今天我们所享受的现代化生活，计算机、电影、电视、飞机、核电站、无线电通信、汽车、火车、轮船，无一不是在这二百年中发明应用的。人类的知识也有了巨大的扩展。

这一巨大的变化是什么造成的？一般的回答是科技的进步，但这是一个肤浅的看法。如果没有制度的安排，科技无法应用于社会，不能起到改善生活的目的。市场制度使其有益于社会，能够创造财富的科技得到发展，淘汰掉那些无用的科技。正如专利发明中只有极少数得到实际应用，因为其余的虽然构思巧妙，但对社会无用，不能创造财富。

市场制度远不止于有利于科技的发展，它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此以前，个人想得到享受，要靠获取权力。谁的权大，谁就享受得多。大家争夺的是权力，而权力是有排他性的。皇帝的权最大，但皇帝只有一个，大家都去争皇位，闹出无尽止的阴谋诡计和亲属之间的残杀。人的聪明才智全都用于互相争夺，市场制度却不同。要想得到享受靠赚钱。赚钱不是剥削，而是财富的创造。赚钱没有排他性。你能创造财富，我也能创造财富。大家都能发财，彼此不会妨碍。

更奥妙的是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创造了物，而物尽其用靠交换。财富主要从交换中被创造，因为交换提升了物的使用价值。交换是两个人的事，所以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不可能赚钱，要赚钱先要让别人得利，这是市场经济之所以有极大的财富创造动力的原因。一切平等自由的交换都一定创造出财富，都一定是双赢的。全社会从彼此搞阴谋变为彼此合作。人的聪明才智都用于创新发明，不再用于彼此算计。社会得到加速的发展。

市场制度的安排消灭了因争夺资源而引起的战争。资源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完全没有必要打仗，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日本。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目的，就是解决它发展需要的资源——石油、橡胶、铁矿、粮食等。为了资源它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还进而侵占菲律宾、泰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试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现在日本仍然是资源穷国，但是经济强国。它不靠战争得到了它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全世界的政治家必须懂得保卫

世界市场的重大意义，这超过了其他一切的考虑。

市场是有效的，它能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但是它不能公平分配，这是市场制度的重大缺陷。人与人的生理需求相差不大，但是赚钱的能力相差巨大，造成人与人在生活水平上的巨大不公，所以要有市场之外的力量来调整收入分配。另外，环境保护也不是市场自己所能解决的，还有公共服务、对垄断利润的限制也都需要市场之外的力量。所以政府作为市场外的力量是需要的。不仅仅是政府，NGO同样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

在市场中，决策是个体分别作出的，因而难免有盲目性，好在它能够自我纠错。只要信息畅通，人民有自由选择的机会，盲目性不会搞得太大。但是金融危机是一个例外，虽然最终也能回到均衡状态，但代价巨大，这一点至今没有克服的办法。之所以我们没有选择市场制度以外的体制，是因为相比之下还是市场制度比较可靠。其他的制度问题更多，比如公有制，以为它能避免私人资本所造成的种种毛病，但事实上它的毛病更多，也更难解决。人类因为试探这条道路，牺牲了上千万的人口才觉悟过来，至今也还有少数人迷恋其中。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讨论市场过程的含义仍有着巨大的意义。

译者的话

《市场过程的含义》（*The Meaning of Market Process*）一书，出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M. Kirzner）之手，它秉承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传统，又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本书的副标题“论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界定了全书论述的范围，而主标题《市场过程的含义》则道明其论述的主线为市场过程及其相关理论。在原文前言里，作者柯兹纳强调，本书既是对经济理论的现代历史，也是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当代复兴的一个贡献。作者在书中梳理了奥地利学派的学术史研究成果，剖析了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观以及与之相关的主观主义方法论。一些学者认为，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方法论从根本上来说，与主流经济学主张存在市场均衡倾向的观点无法调和。对此，柯兹纳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逻辑一贯地加深奥地利学派的认识，不一定要否定主流经济学的主旨（即将市场结果理解成倾向于根据资源约束情况反映消费者的相对偏好），而只需强调主流经济学的这些结论只有通过引入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主观主义思想才能得到自洽的捍卫。也就是说，柯兹纳试图在奥地利学派的非均衡论和主流经济学均衡论之间铺设一座桥梁，因此，他虽然坚持非均衡论，反对主流经济学中的均衡论，但认同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可均衡性，”观点，不认同可实际上达致均衡。正是这种对“可均衡性”的认同，铺设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之间的桥梁。这种“可均衡性”意义重大，不等同于达致均衡本身。

可用来正确理解这种“可均衡性”以及“均衡化”过程的理论，就是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西方是一门生机勃勃的科学，绝非“沉闷的科学”（dismal science）。^① 把经济学视作“沉闷的科学”，有其较为久远的历史，马尔萨斯（1766—1834）在其1798年发表的《人口学原理》中曾作出一个著名预言：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② 19世纪苏格兰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曾于1839年写道，这种场景是“沉闷的”。^③ 10年之后，他于1849年在一篇有关为重新引入蓄奴制度辩护的文章中，提出社会科学是一种“沉闷的科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把经济学戏谑地称为一种“沉闷的科学”，甚至张冠李戴，误以为卡莱尔鉴于马尔萨斯的上述预言而将经济学贴上“沉闷的科学”之标签。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其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根据该报告的预言，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五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是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全球的增长将会因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于21世纪某个时段达到极限，也就是“增长的极限”。该报告进而建议，要避免因超越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世界崩溃，最好的方法是限制增长。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无疑与马尔萨斯的预言一脉相承，又一次描绘了人类未来“沉闷的”前景。^④

① Thomas Carlyle, “Occasional Discourse on the Negro Question”, *Fraser's Magazine*, 1849.

② Malthus, Thomas Robert,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1st ed. London: J. Johnson, 1798.

③ Carlyle, Thomas, *Chartism*, in *Pamphlet*, 1839; Carlyle, Thomas: *Chartism*, Boston: Charles C. Little and James Brown, 1940.

④ Meadows, Donella H., *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Universe Pub; 2 edition, March 1972.

不过，对于是否存在“增长的极限”，仍然存在两类观点。罗马俱乐部属于悲观主义者，认为存在“增长的极限”，要用“堵”术限制增长，使得人类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系统能够处在一种平衡状态，也就是实现推行“堵”术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这需要人类以牺牲个人的自由和享受为代价。部分乐观主义者否认存在“增长的极限”，部分则认为，即便存在，它也是不断地被往后推移，人类也永远看不到，这等于没有极限，因为人类的知识、制度、技术和组织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新的资源会不断被发现，新的技术会不断被发明，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由此也不断被拓展。正因为如此，乐观主义者主张通过推行“疏”术来促进增长，增进财富，增进个人的自由与享受，也就是实现推行“疏”术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其要旨在于增加人类的知识，改善人类的制度、技术和组织，其核心就是发展善治所必需的制度体系，并实现善治。

对于罗马俱乐部那些悲观主义者来说，经济学无疑仍然是一种“沉闷的科学”。其任务不再是促进经济利财富的增长，而是要对其进行限制。而对于乐观主义者来说，经济学不会“沉闷”，正好可以大展身手，促进人类经济与财富的增长。

在很多人眼里，现代的经济学世界流派纷纭，迷雾茫茫。一个单一的个体已经很难掌握全部经济学的知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使很多人迷信于“需求管理”和赤字财政，它也意味着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古典经济学退居二线。与此同时，新古典经济学越发成为显学。很多主流经济学家踊跃充当“帝王师”，新古典经济学也成为辅佐“帝王”的“御用工具”。其结果是，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宏观经济学，在很多国家成为政府权力恶性膨胀、侵犯私人产权的工具。很多新古典经济学家专注于扩大政府支出，维持短期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支付，而置个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产权于不

顾。目前的世界各国似乎都已沉湎于这一轰轰烈烈的全球“产权破坏运动”之中。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家绝对不会觉得主流经济学是“沉闷的科学”。但对于很多宪政主义者来说，主流经济学因其在破坏产权方面助纣为虐，确实是够“沉闷的”。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不属于主流经济学，没有参与到上述全球“产权破坏运动”当中。相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坚持产权保护，坚持市场经济是增进人类发展和福祉的唯一道路。一般人以为，奥地利学派既然不是主流，就没有借鉴和利用的必要。事实上，作为显学的主流经济学看上去是一条主流，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看上去只是一条支流。但是，如果把经济学放在时间的长河中，这条支流就有可能成为主流。其实，即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支流，它代表的是一种米塞斯意义上的人类行为学^①，涵盖个人在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的所有选择，它与其他非经济学领域的学科是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的，比如与个人主义哲学和宪政主义思想的关系，由此构成的洪流目前实际上要远远大于新古典经济学这条“主流”，它在未来也应能代表经济学的长远发展方向。新古典经济学则不然，它与人类迄今为止在非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相互隔绝、相互背离，其本质是强调在经济领域通过政府权能的相对扩张和私人领域的相对压缩来促进“社会总福利”意义上的整体“自由”，而这种整体“自由”是一种幻象，往往是建立在损害个人的自由基础上的，因为个人福利不能简单加总，而且往往相互冲突。在西方国家，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学往往与现代民主政体的多数表决制一拍即合，造成“多数暴政”，成为践踏个人自由的帮凶。在某些东方国家，新古典经济学往往与政府威权体制相结合，也会对个人自由造成侵犯。可以说，新古典经济学

^① Mises, Ludwig von,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3rd revised ed. Chicago: Henry Regnery, 1966.

中的宏观经济学虽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总体上是一门伪科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没有此类问题。

国内对奥地利经济学的关注在不断扩大。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落脚点是对个人及其行为的分析，将个人行为看成在真实世界里基于自身偏好与主观价值观所做的选择。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有关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将对个体生产活动的分析建立在了个体消费者的偏好、需求与主观价值基础之上。每一个消费者的自我选择都受到自身偏好与价值观的影响；而这些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价值观决定了消费者的需要，影响所有生产活动的数量与方向变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致力于分析个体面对真实环境时的状态，认为生产活动建立在对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预测之上。奥地利经济学还是一门有关个人基本权利的经济学，主张私人财产是有效运用资源所不可或缺的，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发展经济的主导力量，论证了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秩序”和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①，是一条通往自由与繁荣之路，坚信政府对于市场过程的干预将会导致非意图的不良后果。

奥地利学派的形成可以1871年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的出版为标志。^② 该书一出版，即对英美世界处于统治地位的英国经济学构成了一系列挑战，也对德国主流经济学派历史学派经济学构成了挑战。门格尔把经济学视为个人选择的理论科学，推演出了一系列普遍规律。他在英美世界复兴了“经院哲学—法国”式的经济学。而且经过他的努力，这种理论更加巩固。^③ 但是，当

^① 参阅 Friedrich August von,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 1: Rules and Order. Routledge & Kegan Paul, First edition edition, Oct. 1973, 以及 Hayek, Friedrich August von,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② Menger, Carl,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Wien: Braumüller, 1871.

^③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What is Austrian Economics”, <http://mises.org/etexts/austrian.asp>.

时德国历史学派排斥理论和普遍规律，认为经济学只是经验科学，不过是一种数据的堆积，目的在于为国家服务。^① 门格尔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推演、总结出他们认为的普适价值和普世规律，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总是让人推演出一国的特殊论，尤其是德国特殊论，或者“德国模式”。如果放在中国，就容易推演出“中国特殊论”，甚至“中国模式”。但是，一国“特殊论”或者“模式论”容易以偏赅全。中国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自由有所增进和维护以及经济运行环境较为稳定的结果。所谓的“中国模式”论总体上是指通过维护某种程度上的经济自由并结合以威权政治控制来推进经济增长。但是，如果这是模式的话，其名称就得改叫“东亚模式”了，因为东亚国家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早就如此行事。经济发展实际上遵循“大下模式”，它包括两大部分的因素：一是经济自由的增进和维护；二是保障经济运行的稳定环境。它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在最初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威权政府或者宪政自由体制均可在实现以上两个因素方面发挥较好的作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而经济发展水平到了一定阶段后，要实现较高水平的人均收入，则须通过宪政自由体制来增进和维护经济自由，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同时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威权体制往往做不到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甚至会束缚生产力。这样一来，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就不能进一步大幅往外拓展，就难以跳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正如在《市场过程的含义》一书中介绍的那样，门格尔出版《国民经常学原理》之后的最初 12 年里，该书备受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冷落。那时还无“奥地利学派”之称，也还未真正出现奥地利学派。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在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陆续

^①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What is Austrian Economics”, <http://mises.org/etexts/austrian.asp>.

发表著述推崇门格尔的思想时，这些新的文献获得了“奥地利”学派的名头，但这在更大程度上是傲慢自大的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们安于这些学者头上的一种“诨号”，而非一种尊称。但是，恰恰是奥地利学派思想独到的洞察力和说服力为其赢得了尊严和生命力。其实；这类事例在经济当中也往往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制造”曾经是劣质品的代名词，后来则是优质品的化身；20世纪80年代，“中国制造”也曾如此，是否在今后也能获得与“德国制造”同等的美誉，则需要国人努力打造。^①

自门格尔以降，涌现了众多杰出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其代表人物包括庞巴维克、维塞尔、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柯兹纳和拉赫曼等。这些学者不断发展壮大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和方法论体系。

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博大精深，主要包括：（1）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它把一切社会现象看作是个体行为和个体之间互动的结果，认为一个集体或者群体不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决策者，集体或者群体只不过是许多个体的组合。（2）主观主义认识论。它承认只有通过有关个人的知识、信息、感知和预期，才能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3）主观主义价值论。它认为，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大小取决于购买者肯为此付出多少代价，也就是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由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需求和条件，客观上不存在所谓“正确”的经济价值或价格。（4）边际效用理论。门格尔完整地提出和阐释了边际效用理论，认为个人占有的某种

^① 胡适先生曾于1919年发表过一篇名为《差不多先生传》的传记题材寓言，讽刺了当时中国社会那些处世不认真的人，也就是“差不多先生”。在寓言中，每个国人效仿“差不多先生”，都成了“差不多先生”。可以说，直到现在，国人仍然多数是“差不多先生”。这种“差不多文化”需要克服，否则最终会影响“中国制造”的声誉。参见胡适《差不多先生传》，《新生活》1919年第二期。

财货的数量越多，它赋予每单位财货的价值越小。^①（5）机会成本理论。按此，机会成本是指由于作出一项选择而被放弃的、价值最高选择的成本。（6）有关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理论。它认为人们的消费有时间偏好，生产活动建立在对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预测之上，提出“迂回性生产”的作用，而这里的“迂回”就关乎时间。（7）提出竞争作为发现程序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竞争是一个过程，是发现很多事实的程序。很多分散知识是在竞争过程中创造和产生的。竞争之所以有价值，部分原因在于竞争的结果不可预知。^②（8）提出市场过程理论。柯兹纳认为，市场过程是由一系列发现而造就的变化构成，这些发现是因为有构成最初不均衡状态的无知的存在。它把市场看作是在所有时间都表现出激励真正的、有价值的发现的强大力量。企业家的警觉在其发现过程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9）人类行为学理论。^③这是一种有关人的行为普遍规则的经济理论。按此，人是“行动着的人”，人的行为的一大特点就是其目的性。人类行为学的研究方法使得人们能以此探索适用于所有人类的行为规律，包括经济规律。人类行为学认为经济问题需要在人类行为学总架构里面加以讨论。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解释方式则有助于针对特定的历史时期

① 除了门格尔之外，还有两位经济学家几乎在同一时间分别提出了边际价值理论。他们是瓦尔拉斯（Leon Walras）和杰文斯（Stanley Jevons）。正如柯兹纳在《市场过程的含义》一书中所言，门格尔1871年的《原理》与杰文斯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斯1874年发表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均被公认为“边际主义革命”的一个中心成分。参阅 Jevons, W. S.,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1871, 以及 Walras, L., *Eléments d'économie politique pure*, Lausanne: Corbaz, 1874。

② Hayek, Friedrich August von, *Der Wettbewerb als Entdeckungsverfahren*, at a 1968 Lecture Sponsored by the Institut für Weltwirtschaft at the University of Kiel, Kieler Vorträge, No. 16.

③ Mises, Ludwig von,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3rd revised ed, Chicago: Henry Regnery.

进行研究。此外，奥地利学派的周期理论、资本结构理论等，均是独到的、有特色的理论。

我国大陆对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著作的译介，从我个人所掌握的资料看，新中国成立前就有。庞巴维克的《马克思主义之崩溃》发表于1936年。^①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文革”，也有一些译介问世。比如，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和哈耶克的《物价与生产》出版于1958年，^②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出版于1959年，^③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出版于1962年。^④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发表于1964年。^⑤“文革”期间，这方面的译介出版工作基本上停顿了。“文革”结束之后，奥地利学派的著作逐渐恢复出版。比如，维塞尔的《自然价值》出版于1982年，^⑥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出版于1989年版。^⑦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奥地利学派译介作品开始日渐增多。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出版于1995年版。^⑧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另译为《自由秩序原理》）出版于1999（1997）年，^⑨《通

① 欧根·冯庞巴维克：《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崩溃》，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版。

② 参阅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絜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以及海约克《物价与生产》，滕维藻、朱宗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③ 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何昆曾、高德超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版。

④ 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藤维藻、朱宗风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⑤ 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版。

⑥ 弗·冯·维塞尔：《自然价值》，陈国庆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⑦ F. A. 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文跃然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⑧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⑨ 《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有两个译本：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以及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冯兴元、陈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后者参照了英文版和德文版两个版本翻译。

往奴役之路》的新译本出版于1997年^①，《法、立法与自由》与《致命的自负》均出版于2000年。^②其后，奥地利学派的译介趋于“井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名字，如门格尔、庞巴维克、米塞斯、哈耶克等，越来越为更多的国人所耳熟能详。

《市场过程的含义》的作者柯兹纳是继米塞斯与哈耶克之后最杰出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他1930年2月13日出生在英国伦敦，1940年随家人迁居南非，1947—1948年就读于开普敦大学，1950—1951年入读伦敦大学国际项目，并于1954年获得布鲁克林学院最优等学士学位，1955年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学完MBA课程后，柯兹纳偶遇米塞斯，当即决定放弃会计专业而决心成为一名学院经济学家。1957年，他曾短期担任布鲁克林学院讲师职务。同年，他在米塞斯的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获得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在1960年以《经济学视角》(*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为题出版。其后，他在纽约大学执教。1968年担任该大学经济学教授，直至2002年正式退休。其后，柯兹纳一直作为荣誉退休教授发挥作用。

柯兹纳是奥地利学派、米塞斯思想和经济学方法论权威专家之一。其主要研究工作集中在有关知识、市场过程和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分析，以及市场伦理研究。他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成果有其独到之处。2006年，柯兹纳由于提出强调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过程运作重要性的经济学理论而获得全球企业家精神研究奖。

柯兹纳迄今为止出版了17部著作，其中最经典的作品为1973

^①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哈耶克：《法、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冯克利、胡晋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